

## 学习有理

# 近代浙商的人文情怀与商业反哺

冯筱才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2023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看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布置下这么一个题目。古往今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浙江人敏于挖掘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善于向经济活动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 一、近代浙商的崛起

晚清“五口通商”之后，商人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角色日渐重要。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廷在财政上被迫倚重工商税收，商人捐纳也流行于一时，洋务运动赋予投资新型工商业更多的政治正确性。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许多士人不再以经商为偏途，尤其是新政改革浪潮中，清政府大力奖励创办工商业，于是，商人的社会地位日渐上升。中外通商重心在晚清已经由原来的广州转移至上海，浙江商人以地利之便成为上海主要地域商业人群，其势力在国内各通商大埠也迅速发展。

不同时期商人的背景不大相同。如果按时段来区分的话，早期按照中国传统商业习惯培养出来的商人仍是主流；但洋务运动之后，一些有功名的读书人也开始进入商界，并扮演重要角色；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随着接受新学教育者甚至留学回国者从商者众，新派浙商开始崭露头角；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批浙江商人进入政府机构，与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新型商人成为主流。

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论，至少宋代以降中国人多以儒家文化为本位。而儒家社会尊崇“四民秩序”——“士农工商”，商人至少在名义上并不是社会轴心，“轻商”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文化风气。俟至近世，虽然在国家经济上商人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商人未必在民间社会已得到普遍尊重。因此，懋迁有无者如何提升自我及其家族的2023年社会地位，往往成为其思考的重点。

因此，无论是哪种背景的商人要立足社会，公益服务精神仍属必要。所谓公益包括投资于文化事业或创办慈善机构等，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也比较相符。同时，在近代国家危亡形势下，社会舆论也希望商人能够“爱国轻利”，因此，至少在对外表达上，商人即被要求以家国为重，投身于社会及文化事业。当然，在任何时代，如果许多人有类似行为，甚至蔚为社会风气，后面要么有传统社会结构在支配，要么有国家政策在倡导。近代浙江商人人文情怀的背后，其实也不外乎这两种动力作用。

## 二、近代浙商人文情怀的成因及特征

政府制度对于商人捐资办教育、支

持文化事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奖励善行的制度规定往往有明显效果，社会文化氛围亦会更加浓郁。中国很早就有鼓励民间创办义学，成立支持参加科举考试的基金（时称“宾兴”）的传统。近代这种政策激励，越来越与一些实际的荣誉身份挂钩起来，譬如捐资办公益在清末可以获得一定级别的功名。这种做法虽常被那些正途出身的人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政策理性的角度来看，捐纳制及其他奖励制度，使得商人更加愿意乐善好施。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的民间公益慈善制度其实相当成熟。晚清以商人为主的义赈活动，即多由慈善机构直接将捐款或捐赠物资发放给受助者或被捐助者，中间费用很低。如果是捐资兴建宗教或教育机构，那么捐款人对机构运营有相当的决策权，机构人事亦多由捐助者为主要成员的董事会聘请任命，当然建筑甚至机构由捐款者冠名亦是惯例。这种管理制度经政府备案后得到保护，即使初始捐款人逝世，其后人也愿意继续捐款维持学校运作。这些做法，也都反映了整个社会结构性制度在起作用。

与近代东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有关，江浙商人所支持的社会文化公益慈善活动在当时的中国特别突出，因此可以说“人文情怀”特别强烈。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商人”，更多仍是在工商业为本业的人。这里所讲的“人文情怀”，主要指近代中国历史语境中的人们对文化传承与教育、慈善等活动的关注意识，这种关注往往会超越现实利益，并且对文化教育的继续发展有正向贡献。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浙江商人在哪些方面表现何种“人文情怀”，以下稍微举例加以说明。

浙江商人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或者其人文情怀，最普遍的体现便是投资兴办教育。晚清废除科举大办新学之后，全浙各府都开始将原来的旧制书院改办成新式学堂。与此相对应，一大批新式小学堂亦开始被举办，经费则多赖商人捐款。当时江浙两省商人捐资兴学方面的热情领先于全国。著名者如胡乃麟在家乡杭州捐出巨资创办安定中学堂，慈溪旅居日本侨商吴锦堂在原籍创办锦堂学校，宁波巨商叶澄衷在上海花费巨款创办澄衷公学，都是国内有名的商人办学案例。上虞籍绅商经元善1898年在上海创办正女学，开风气之先，轰动一时。不但个人捐资办多个学校，浙江商人旅居外地，往往成立同乡团体以办理公益慈善事业，其中教育便是主要事项，如宁波旅沪同乡会曾在上海创办10余所小学，天津浙江会馆也创办浙江旅津公立小学，都是群策群力重视教育的例子。后来虞洽卿等宁波商人曾倡办四明大学，这可算是后来包玉刚捐资办宁波大学之先声。四明大学筹办费用后来移作教育基金，奖励成

绩优异的同乡子弟。这种商人捐资创办的教育基金在近代浙江并不少见。

浙江商人对文化另外一方面的贡献就是创办藏书机构，整理乡邦典籍，弘扬文化传统。浙人素好藏书，晚清中国四大藏书楼，浙江独占其二（湖州笥宋楼与杭州八千卷楼），其兴衰命运都与经商有关。1920年代，浙江富商刘承干在南浔兴建嘉业堂，藏书60万卷，其数量与价值当时号称海内第一。公共图书馆在浙江之兴起，背后也多有商人出力。如湖州兴建海岛图书馆，当地丝商、缫宋楼主人陆树藩就曾大力支持，无私开放其藏书供学生及社会各界阅读。温州创办籀园图书馆，温州政商名人黄群等人亦予以支持。近代浙人对乡邦文献整理极为关注，一旦有整理计划，商人多乐于捐资促成义举，如刘承干出资编《吴兴丛书》，黄群等人发起编纂《敬乡楼丛书》，宁波商人支持张寿镛等人接力完成《四明丛书》的编纂，都可为后人示范。宁波旅沪同乡会还在上海办理月刊，定期刊载乡邦文献，保留甚多珍贵史料。

近代浙商特别重视文化，可能也与拥有科举功名者进入商界者较多有关。江浙本来就是科举人才大省，当政府大力倡导振兴工商，并且出台具体的奖励制度时，自然吸引了一些科举功名获得者的注意。例如海盐籍的名人张元济，先拥有进士与翰林功名头衔，后来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名商，他不但创办商务印书馆，还尽力搜集各种珍贵图书加以典藏，又开创性地编纂新式教科书。另外一起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竞争者的中华书局，其创办人陆费逵其实也是浙江桐乡人，原为张元济手下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这两家出版社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这类转型时代的“儒商”在抢救濒危传统文化方面亦颇有贡献。如中国古琴传统能够传承，湖州商人周湘龄功劳至伟。周湘龄本为秀才出身，精于诗词琴画，后成为两浙著名盐商。他还热心公益，如创办学校与医院，修葺古迹，赞助补抄文澜阁藏书等均不遗余力。但是他一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业绩，却在于整理保存古琴艺术，他不但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古琴收藏家，还著有许多琴史著作。

当然，新型商人在传承中国文化方面也不亚于科举制度以来的人物。如中国近代著名书画家吴兴人王一亭便是一显例。王一亭本业是日本轮船公司买办，曾师从许多名师学画，后来成为海上画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王一亭也是中国佛教界重要人物，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对于公益善举向来都身先士卒，更何况逝世也与巡视其创办的传染病医院时感染有关。其他又如宁波商业世族——小港李家与中国近

## 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

谢 萍

人员工作量，真正做到提质增效。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建立“我要出差”“我要打的”“我要买书”等不同的应用场景。这些场景的建立可以和相关单位合作，教师和学生只负责在系统上下单，财务审批流程嵌入到下单审核过程中，通过审核后由合作单位提供服务或货物，师生直接获取即可，学校财务直接和供应商清算，后续不用再走报销审核程序。这样既可以解决教职工报销难问题，让教职工无感报销，又有助于避免相关人员费用超标准、算错补贴、真发票假业务的情况发生，使相关的证据链更加闭合完整。加强数字化建设可以使财会监督“一竿子插到底”，不仅可以监督项目支出时是否符合财务规范，还可以实时监控项目的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完成情况。数字化建设可以为每个项目建立专项档案，实现项目从立项、审核、执行阶段到预算执行的吻合程度、执行是否合规、项目完成后评价的全过程追踪。

三是高效协同，完善监督机制。财会监督、审计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三者共同构成高校全面监督机制和监督体系，三者虽然隶属于不同部门，但目标一致。为完成目标就必须促进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打破数据孤岛，形成监督合力。因此，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健全审计、审计、纪检监察三合一的协同监督平台是构建监督合力的关键。

发挥整体智治功能，打造融服务、管理、监督于一体的财务经费服务场景，为教职员工便捷合理用经费提供服务，充分调动教职员工科研、教学和育人工作的积极性，实现监督关口

代美术发展亦甚有关系，张大千曾在上海长期得到李家人关照，与李祖韩、李祖莱、李秋君等人关系都极为密切。李秋君则是中国女子书画会的创办人，她父亲沙船业巨商李薇庄，其实亦是王一亭早年的伯乐与赞助者。

浙江近代人文鼎盛，名人辈出，与商人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密不可分，这种热衷也可以从他们子女后来的成就中发现。如新诗圣手徐志摩便出自海宁硤石首富徐氏，其父徐申如曾长期担任硤石商会会长，他不但经营酱园、丝厂、钱庄及电灯厂等业，还是浙北地方公益事务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参与救济事项甚多。

### 三、人文情怀的商业反哺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商人在价值认同上的人文向度，也会反哺他们的商业活动。商人在营商时，有时就未必以“利润”为唯一考量要素，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也要求商人不能完全唯利是图。社会价值、公益性，便成为一些商人经营时需要考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由商人组成的行业协会，自然较容易在行业规范上采取有效的管理举措，行业规则也比较容易得到普遍尊重，这对于各行各业的健康发展不无助益。商会与行业协会在近代中国往往成为地方公益事务的主要倡导者与维护者。

商人的人文情怀，也会使企业在文化上有更多投入，对企业文化有正面影响。如湖州籍丝绸商人蔡声白对传统儒家伦理与新式科学管理思想都有研究，他后来成为美亚织绸厂的总经理，并打造出中国规模最大的丝绸织造企业集团。他在美亚不但创办《美亚周刊》，也鼓励职员举办文化俱乐部，其企业文化以科学管理为本位，在当时的中国堪称新式工厂模范。美亚的团队干部，后来便成为江浙沪地区素质较高的机器织绸业专业人士。

总之，在近代中国，金钱未必是个人地位最重要的决定要素，文化品位及社会贡献度才是决定个人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准。当然，这里所讲近代商人的情怀，未必比传统中国更为强烈，也未必是浙江商人独有这些情怀，只是文化与经济之关系如此密切，江浙地区在近代本来就商业与人文同时繁荣而著称，所以浙商在晚清民国时期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贡献便很显著。浙江以外，近代中国其他各省市商人在社会文化公益慈善方面的贡献亦非常大。那个时代许多商人身上所具有的人文情怀，值得今天商界人士传承和借鉴。

【作者为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社科论衡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张 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基本国情，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新型民族关系进行深邃思考，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赋予党的治国方略在民族工作领域新的时代内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着眼于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民族关系实际和民族工作主要任务，不断深化对民族问题的认识，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各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为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统一了思想，指明了方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实到具体的民族工作中，就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深刻体现中华各民族命运相融、利益相连、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与未来景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时代硕果。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审时度势地把握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重大命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澄清了当前我国民族理论领域的诸多争论和模糊认识，是对新时代我国民族问题旧有新生现象和民族关系深刻变化的正确看待，体现出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认识的思想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认知在实践中不断开辟新境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之一是“统一性”。中国之所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跟“大一统”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大一统”的思想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深化于秦汉以来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和灵魂，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国家建构的思维模式。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中，“和合”文化对于维护和发展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有着积极作用。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之间是“和而不同”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容各民族文化差异，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是各民族多样性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统一。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融合发展与华夏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已然共同熔铸、形成了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体现出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滋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批判与超越。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大多基于欧美民族形成过程和民族矛盾处理方式，侧重于以种族区分民族，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中国的民族形成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抵御并消除了西方民族观念对形塑中华民族的消极影响，摒弃了西方民族主义的排外性。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尽管都称为“民族”，但二者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精神，从而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对西方民族主义狭隘范畴的批判与超越，深刻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念。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

## 之江智库

## 以“三个走向”做大做强科创飞地

郑功帅

飞地经济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空间组织形态，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做大做强科创飞地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落实“十四五”规划、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有益探索。科创飞地要做大做强必须抓实抓实“三个走向”。

从“暗地”走向“明面”

如果不考虑为数不多的扶贫型科创飞地，较之于传统的产业飞地，一些科创飞地并不是两地政府间合作的产物，而是飞出地政府在飞入地的“暗地”行为。有些科创飞地或者承载了飞出地一定的招商功能，或者直接受飞出地招商局管理。由此导致发展存在落差的两地原本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关系，可能会异化成两地间的竞争关系。

飞出地政府对飞出地政府借助科创飞地暗地“抢商、挖墙角”问题的这种担忧，使其在态度上对科创飞地不重视、不认可，在行动上不支持、不配合。科创飞地要做大做强，关键之一是在区域间关系，从“暗地”里的低质竞争走向“明面”上的高效合作。要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在目标定位、建设投入、运营管理、财税分成、人才认定、社会保障等关键领域，建立常态化的有效协商合作机制。

从“单向”走向“双向”

后进地区发展科创飞地的目的，是通过跳出本地，在域外突破域内高端要素不足的瓶颈。然而，人才、技术、管理等高端要素，何尝不是发达地区的稀缺资源。要如何调动飞入地政府的积极性，便成为做大做强科创飞地的重要支撑。有专家提议，建立科创飞地税收在两地间的财税分成机制。但需要认识到：一方面，作为飞入地的发达地区，虽然科创资源相对丰富，产业化的空间却相对不足，因此有发展空间的诉求。另

一方面，研发和生产是互补性的链式存在，因此科创飞地和产业飞地也是互补性的整体存在，不可孤立地看待。可见，“双向”飞地才是最好的选择。是做大做强科创飞地的关键之二。即在发达地区建设科创飞地的基础上，对等地在对应的后进地区建设产业飞地。研发过程两地或出资或出力，产业化过程两地共同分享成果，才是长久之道。可见，双向飞地是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很多飞地发展的实践证明，为实现研发创新和生产经营的良性互动，两区域的距离不宜太大，在高铁一小时或驾车两小时的半径内布局双向飞地，往往成功率高、可持续性好。

从“局部”走向“整体”

高端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化集聚，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作用下的自然结果，其在宏观层面上必然表现为产业或产业链各环节在空间上的再布局。科创飞地是在中国特色的区域关系格局下，某些后进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局部”层面上，突破本地资源要素的瓶颈，积极在更大范围内探索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尝试。然而，要实现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激发更大的产业调整红利，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产力布局的空间再造。仅靠市场或基层地方政府的作用，难堪大任。为此，需要省级政府层面在“整体”上进行科学、统一的产业布局调整，这是做大做强科创飞地的关键之三。对新兴产业或产业链的高端研发环节，由于其高技术、高投入、高端人才的“三高”特性，要在发达地区规划“大科创飞地”。大科创飞地是大科创生态系统，要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开放性和高赋能性，从而减少各地零散的重复投入。要大力支持地方与此平台系统进行常态化、个性化的嫁接，打造“大科创飞地”+“小科创飞地”的平台化互补协作模式，从而助力各地差异化的产业升级。【作者单位：中共诸暨市委党校】

## 重要窗口 理论周刊·知行